

汉语“数·量·名”结构产生刍议

龚 阳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汉语“数·量·名”结构产生于先秦时期,其过程经过了两条途径:一是在甲骨文、金文中,“名·数·量”经过了“名·量”、“量·名”两个阶段,进而转化为“数·量·名”结构;二是金文以后,“名·数·量”经过“数·量·之·名”阶段而过渡为“数·量·名”结构。

关键词:“数·量·名”;转化;系统性

关于汉语“数·量·名”结构的产生,刘世儒认为“数·量·名”是由于语言“体系的整体化”,“为了排除分歧,统一规则,使语序规律更趋于严整化、简明化”,由“名·数·量”的数量结构前置造成的。^{[1](P.45)}屈承熹认为从“名·数·量”到“数·量·名”,“也许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语序变迁问题,而是一种结构的精简步骤。换言之,这是一种将句子变成名词的方法之一”^[2]。沈培认为“数·量·名”是由同位词组重新分析而成。^{[3](P.208)}贝罗贝认为“数·量·名”式是由所谓“名1·数·名2”消失所引发的重新分析造成的。^[4]金福芬、陈国华在论述量词前置中心名词结构的出现时认为,“数·量·名”形式是由于表修饰关系的标志“之”逐渐脱落,也就是说“数·量·名”是由“数·量·之·名”这种偏正名词短语转化而来的。^[5]张延俊对“数·量·名”结构的确立有比较具体的论述,认为“数·量·名”的演变是“从‘名·一·量’的省略开始的”,“‘名·一·量’省略为‘名量’”,“‘名量’转换为‘量名’”,“‘量名’补足为‘一·量·名’”,最后“‘一·量·名’完善为‘数·量·名’”。此外,他还认为“数·量·之·名”可能对“数·量·名”的产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并不是‘数·量·名’式产生的主要来源”^[6]。潘玉坤与张延俊的推测很接近,但是他认为“量·名”无须补足为“一·量·名”,而是直接的“使用范围扩大,不限于数词为‘一’”^{[7](P.192)}。刘世儒、屈承熹、沈培、贝罗贝各家只是对“数·量·名”结构的附带论及,具体过程皆语焉不详。金福芬、陈国华论述缺少证据,不易让人信服。张延俊、潘玉坤论述具体过程虽然详细,但是我们考察先秦汉语的使用情况,发现其论断并不全面。以上七种论断虽不尽相同,但有

一点是共同的,都认为“数·量·名”是由“名·数·量”转化而来^{[8](P.7)},因为修饰语置于中心名词前是汉语的一般规则。因此,下面试从“数·量·名”结构产生的过程、动因等方面加以论述。

一、“数·量·名”结构产生的过程

名词、数词、量词这三个成分,从理论上讲可以有12种组合方式:a、名·数;b、名·量;c、数·名;d、数·量;e、名·数·量;f、数·量·名;g、量·名;h、量·数;i、量·名·数;j、名·量·数;k、数·名·量;l、量·数·名。考察汉语名词、数词、量词的搭配结构,合乎语法规则的是a、b、c、d、e、f、g七式,其余五式在汉语中是不存在的。七式之中,a、b因与量词无涉,在此不论。d与名词无甚关联,在此亦不论。剩余b、e、f、g四式我们可以归结为两大类:

A、名·数·量 名·数·量(当“数”大于“一”时,“数”不可省)名·量(当“数”为“一”,“数”可省去)

B、数·量·名 数·量·名(当“数”大于“一”时,“数”不可省)量·名(当“数”为“一”,“数”可省去)

由于甲骨文、金文中并未出现“数·量·之·名”的形式,因此A与B之间的转化,即“名·数·量”转化为“数·量·名”,只可能产生在“名·量”与“量·名”之间,即当“名·数·量”中数为“一”时,“名·量”产生,可以转化为“量·名”。“名·量”在甲骨文中已经存在,而“量·名”则出现在金文中。因此,这种演变大概始于金文时期。我们可以对下面的例子进行比较。

“名·量”结构:

收稿日期:2007-6-25

作者简介:龚阳(1983—),男,河南南阳人,郑州大学文学院2005级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研究生。

懋父赏御正卫马匹,自王。《御正卫簋》
 庚戌卜贞锡多母又多贝朋。《殷墟书契后
 续》下8.5)
 锡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不其
 簋》
 锡克甸车、马乘。《克钟》

“量·名”结构:

用匹马束丝。《鬲鼎》
 王赐乘马,是用佐王。《虢季子白盘》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诗经·泮水》
 贲于丘园,束帛戔戔。《易·贲》
 与之簞食与肉。《左传·宣公二年》

甲骨文、金文中量词的语法意义虽然是在不断加强,但其词汇意义依然很明显。量词的词义比较实在,对名词的依附并不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是相对独立的。因此,“名·量”转化为“量·名”的可能性是具备的。另外,受修饰语置于中心名词之前的一般规律制约,“名·量”转化为“量·名”也成为一种必要。在甲骨文中,名词短语中的修饰语,除数量词外,全是置于名词之前的。西周金文中修饰语修饰中心语,亦是位于中心语之前,没有例外。在“名·量”转化为“量·名”以后,“量·名”即是非常简略了,人们若是需要更明确地表达语意,便须把省略的“一”补出。于是,“量·名”就成了“一·量·名”。“一·量·名”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甲骨文、金文中并未发现。例如:

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孟子·告子上》
 力不能胜一匹雏。《孟子·告子下》
 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尚书·秦誓》

但是,“一·量·名”仅是“数·量·名”结构的一种特殊表现,此时“数”为“一”。我们不认为“数·量·名”结构完全是在“一·量·名”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种特殊表现并不是“数·量·名”结构确立的主要来源。

如果在甲骨文、金文中,“名·量”转化为“量·名”是“数·量·名”结构形成的一种比较特殊的途径,那么,金文以后的资料则可以证明“数·量·名”结构的的确立则主要是由于“数·量·之·名”的发展。“一·量·名”的确定似乎便于接受,但是,当“数”大于“一”时,“数”总是位于“名”之前,这当然也会影响“数·量”的前置。

此时,数目的问题与汉语修饰语置于中心名词前这一规律表现出了不一致,不过人们选择了服从语言规律。可是,如果猝然将“数·量”移至名词之前,思维上必然不能立即接受。这时,仍需要有一个标记做出说明。“名·数·量”转化为“数·量·之·名”,“之”作为标记,引出了被“数·量”结构修饰的名词,使量词粘附于数词修饰中心名词的关系更加突显。我们可以对下面的例子进行对比。

“名·数·量”结构:

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
 丧三年。《礼记·檀弓上》
 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槨,
 以为法式。《庄子·天下》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
 地,夫一廛,田百亩,菜五十亩,余夫亦如之。《周
 礼·地官·遂人》
 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
 鼉鱼鳖之所不能游也。《庄子·秋水》

“数·量·之·名”结构:

三年之丧,吾从其至者。《礼记·檀弓上》
 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
 不欲速朽也。《礼记·檀弓上》
 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荀子·
 仲尼》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孟子·梁惠王上》
 是故百仞之松,本伤于下而末槁于上。《吕氏
 春秋·先己》

此外,我们对先秦时期的一些传世文献做了调查,可以证明“名·数·量”向“数·量·之·名”转化是一种趋势。情况如下表:

书名	名·数·量	数·量·之·名	数·量·名
《尚书》	10	1	1
《论语》	7	6	2
《庄子》	18	16	1
《墨子》	68	52	27
《荀子》	25	68	2
《孟子》	26	28	8
《吕氏春秋》	45	51	3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金文以后,“名·数·量”在向“数·量·名”转化过程中,“数·量·之·名”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但是,随着这种修饰手段的发展,用“之”表示修饰关系并不是必要的,实际意义也并不大。当人们意识到标记“之”可要可不要时,就会不用它。这也是语言经济性、明晰性的内在要求。对比以下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之”的脱落。

“数·量·之·名”结构:

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墨子·天志下》))

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墨子·天志下》))

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墨子·非命中》))

不构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已处显。((《庄子·天地》))

今齐国五尺之童子,力皆过婴,又能胜君,然而不敢乱者,畏礼也。((《晏子春秋·外篇上》))

“数·量·名”结构:

若昔者三代暴王。((《墨子·尚贤中》))

不识若昔者三代圣王。((《墨子·明鬼下》))

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墨子·非命下》))

为万世利。((《吕氏春秋·乐成》))

五尺童子,操寸之烟,天下不能足以薪。((《晏子春秋·谏下》))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将“名·数·量”向“数·量·名”的转化以金文为界分为两期:第一期,即甲骨文、金文时期,“名·数·量”转化为“量·名”是“数·量·名”结构确立的一个比较特殊的途径,此时,“数”仅限于“一”;第二期,即金文以后,“数·量·之·名”是“名·数·量”在向“数·量·名”转化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此时,“数”不限于“一”,多为“二”和“二”以上。如图所示:

时 期	结构转变	条件
甲骨文、金文	名·数·量→名·量→量·名→数·量·名	数=一
金文以后	名·数·量→数·量·之·名→数·量·名	数>一

先秦时期,量词的位置并不确定,有时在名词之前,有时在名词之后,上文对传世文献调查中“数·量·名”的出现次数与“名·数·量”、“数·量·之·名”相比,悬殊还是很大的。另外,在“名·数·量”向“数·量·名”转化过

程中条件性也比较强。因此,我们认为先秦时期是“数·量·名”结构的萌芽阶段。

二、“数·量·名”结构产生的动因

“数·量·名”结构的产生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动因:

第一,语言的系统性。量词词汇意义的衰减,必然伴随其语法意义的增强。随着量词的语法化进程,量词后置于中心名词的结构朝着修饰语前置于中心名词这一方向发展,这是量词作为整个汉语系统一部分的要求,必须做出符合汉语修饰语置于中心名词前的规律的转变。

第二,语言的明晰性和经济性。语言是用于思维和交际的符号系统,明晰性和经济性既是语言自身的发展方向,也是语言交际的基本要求。语音上,“数·量·名”结构作为一个音节较多的联合体,与其他结构的区别更明显,听觉上不易混淆。语法上,“名·数·量”中的数量词对于中心词而言是相对自由的,兼有主谓和偏正两种结构;“名·数·量”转化为“数·量·名”后,数量词就只能修饰中心词的定语,而不可能是其他性质的成分。语义上,量词语法意义不断增强,对名词的依附也越来越明显;名词对量词的限制越来越大,名词和量词的关系就更加紧密。这样一来,“数·量·名”结构意义表达就会更清楚了。

参考文献:

- [1]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屈承熹.汉语的语序及其变迁[J].语言研究,1984,(1).
- [3]沈培.甲骨卜辞语序研究[M].台北:天津出版社,1992.
- [4][法]贝罗贝.上古、中古汉语量词的历史发展[J].语言学论丛.商务印书馆,1998,(21).
- [5]金福芬、陈国华.汉语量词的语法化[J].清华大学学报,2007,增(1).
- [6]张延俊.也论汉语“数·量·名”形式的产生[J].古汉语研究.2002,(2).
- [7]潘玉坤.西周金文语序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8]郭攀.汉语涉数问题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4.

(责任编辑:王东)